

# 古詩十九首探索



2 040 1222 8

# 古詩十九首探索

馬 茂 元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音像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書號 673 字數 63,000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5 $\frac{5}{8}$  檢頁2

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80001—18000 冊

定價 (7) 0.55 元

## 目 次

### 前言

- 『樂府』和『古詩』，『古詩』與『古詩十九首』……………一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和時代……………五  
『古詩十九首』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重大意義……………九  
『古詩十九首』的基本內容，它的人民性和現實性……………一九  
『古詩十九首』的藝術特色，它的繼承性和獨創性……………三六  
關於本書的內容和體例……………五二

### 古詩十九首探索

- 青青陵上柏……………堯  
今日良宴會……………堯  
西北有高樓……………堯  
涉江采芙蓉……………堯

明月皎夜光

九

迴車駕言邁

九六

東城高且長

一〇三

驅車上東門

一〇八

去者日以疎

一一四

生年不滿百

一一六

明月何皎皎

一一三

行行重行行

一二七

青青河畔草

一二八

冉冉孤生竹

一二九

庭中有奇樹

一三〇

迢迢牽牛星

一三一

凜凜歲云暮

一三四

孟冬寒氣至

一三〇

客從遠方來

一七四

## 前 言

『古詩十九首』最早著錄於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這僅僅是十九篇無主名的抒情短詩，可是自從它出現以後，就一直受到詩論家最崇高的評價，『十九首』和『三百篇』往往相提並論；流傳之廣，影響之深，在中國古典詩歌領域中是一件非常特出的事例。這對文學史研究工作者來說，應該是一個值得引起注意的問題。

『文選』裏所選錄的詩歌，篇目極為豐富，而『古詩十九首』則很早就已脫離母體單獨成為研究對象。特別是清代箋注之學盛行以後，更出現了不少關於『十九首』的專著。可是對詩義的理解，牽強附會居多；在文學欣賞方面，雖然不少精闢深透的看法，但也缺乏全面的、綜合性的分析和論證。究竟『古詩十九首』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是怎樣？它的基本內容和它的精神實質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現，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有什麼重大的意義？這些，都有待於我們作進一步的探索。

### 一 「樂府」和『古詩』，『古詩』與『古詩十九首』

所謂『古詩』，一般地說，是指流傳已久，難以確定其絕對年代的無主名的詩篇。

屈原、宋玉之後，漢朝沒有出現什麼大詩人，漢朝的詩歌只有不知名的『樂府』和『古詩』。魏晉以還，個人的創作大大興盛起來，詩人受到社會上普遍的重視，作詩才成為一種專業。著名的作家像曹植、王粲、阮籍、陶潛、謝靈運、鮑照之流，固不必說，即使是『爭價一句之奇』<sup>●</sup>，也都可以馳聲詩壇，垂名後世。隨着詩歌的發展，『古詩』這一名詞，也就不會再出現了。

採集民間詩歌，以之合樂，是漢朝樂府機關職掌中一項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樂府歌辭最主要的來源。其中雖有極小一部分御用文人奉命撰製的歌辭，但究竟是無關重要的。樂府規模，盛於西漢武帝劉徹時代。班固『漢書·藝文志』紀錄的採詩地區，北極燕、代、雁門、雲中，南至吳、楚，西到隴西，東至齊、鄭，可是所採的詩歌，僅有一百三十八篇。這個數字，固然是東漢時的紀錄，難免有散失遺亡；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各地豐富的民間詩歌，決非當時政府所能盡採。這些未被採錄的詩歌，無疑地單獨在社會上流傳；再加上一部分原已入樂而失了標題，脫離了音樂的歌辭，後人無以名之，只得泛稱之為『古詩』。『古詩』和『樂府』除了在音樂意義上有所區別而外，實際是二

● 見『文心雕龍·明詩』，說的是宋初詩壇情況。

而一的東西。現在樂府古辭中假如某一篇失去了當時合樂的標題，無所歸類，則我們也不得不泛稱之爲『古詩』；同樣，現存『古詩』中假如某一篇被我們發現了原來合樂的標題，則它馬上又會變成樂府歌辭了。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的『古詩』都會入過樂，但其中確曾有部分入過樂的。像『古詩十九首』中有好幾篇唐、宋人引用時明明稱爲『古樂府』。朱乾『樂府正義』甚至說『古詩十九首，古樂府也』，即其例證。後人輯錄漢代詩歌，『樂府』和『古詩』的界限總是劃分不清，往往一首詩甲本題爲『樂府』，而乙本則標作『古詩』<sup>●</sup>，這樣的事實是經常看到的。

『古詩』的涵義，和『樂府』同樣的廣泛，可是作爲一個整體而出現在『文選』裏的『古詩十九首』則是漢代『古詩』許多類型當中的一個類型，我們必須把它和一般的『古詩』從概念上加以明確的區分。

第一，『古詩』和『樂府』一樣，其中固然有抒情的詩歌，但更多的是社會性的敘事詩。像『上山採蘼蕪』『十五從軍征』『孔雀東南飛』等篇皆是。可是『十九首』則篇篇都是詠歎人生的抒情之作。從內容來看，自成體系，不同於一般的『古詩』。

<sup>●</sup> 例如『孔雀東南飛』一詩，『玉臺新詠』題作『古詩無名人爲焦仲卿妻作』，『樂府詩集』則收入『雜曲歌辭』題爲『焦仲卿妻』。

第二，『古詩』和『樂府』都是流傳在社會上的詩篇。其中固然絕大部分是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但也有文人的歌詠。收集在一起，作者的階級關係和他們的文化水平是極為複雜，極為參差不齊的。而『古詩十九首』則完全是文人的創製。從作者來看，彼此間又是一致的。

第三，『古詩』和『樂府』，篇幅的長短距離很大。『十九首』裏，沒有長篇，最長的不多於二十句（『東城高且長』，『冉冉孤生竹』和『凜凜歲云暮』三首），最短的不少於八句（『涉江采芙蓉』和『庭中有奇樹』二首）。就詩歌的形式來看，彼此間也是相近似的。

由於上述三個特徵，就使得『十九首』在漢代『古詩』系統中構成了一個具有獨立性的類型的意義，這個類型的『古詩』，就是漢代無名文人創作的抒情短詩。

漢代的『古詩』究竟有好多篇呢？這話很難說。這不但因為年代久遠，散佚太多；而且現存的漢詩，『古詩』和『樂府』也難以劃分得清楚確切。單拿像『古詩十九首』這一類型的『古詩』來說，原來也不只十九首。『詩品』說：『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鍾嶸所指的當然不包括『古詩』中的敍事詩；同時，他所看到的也不會

是全部，可是已有五十九首之多。蕭統編著『文選』時只選錄了十九首，足見他的去取標準是相當嚴格的。『十九首』以外的漢代抒情短詩流傳到現在的也就有限了。雖然徐陵『玉臺新詠』和其他古籍中還存留一些，但時代莫辨，真偽難明，而且對後來的影響也不大。只有這十九篇永恒地放射着強烈的萬丈光芒，照耀千餘年來詩歌發展的道路，歷久彌新。時間的考驗，說明了『十九首』是漢代『古詩』中最精華的部分。它標誌着漢代五言抒情詩的最高成就，同時也概括了這一類型的『古詩』的全部風貌，而成爲我們研究的主要對象。

## 二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和時代

文學的發展，有着它本身一定的演進過程，任何文學作品的出現，決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像『古詩十九首』這樣具有特徵性的成熟的作品，它必然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關於『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和時代問題，舊說最爲紛糾。蕭統著錄在『文選』裏，總題爲『古詩』，當然由於弄不清作者和時代的緣故。鍾嶸『詩品』也說它『人代冥滅』，沒有作出結論。但稍後於蕭統的徐陵『玉臺新詠』則將『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樓』、

『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篇題爲『枚乘雜詩』。後來甚至有人認爲『十九首』都是枚乘的作品①。

無論認爲全部或者部份是枚乘作品，都是錯誤的。『詩品上』曰：『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唱）也。白王（褒）、揚（雄）、枚（乘）、馬（司馬相如）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謂五言詩起於李陵（李詩係後人僞托，是另一問題），足見李陵以前的枚乘時代，還沒有五言詩出現；而且枚乘是『吟詠靡聞』，根本他就沒有從事過詩的創作。

『文選』有陸機『擬古詩』十二首（原爲十四首），凡『玉臺新詠』認爲是枚乘的作品，均已擬及（擬『東城一何高』即擬『東城高且長』）。又有劉鑑『擬古詩』二首

① 『玉臺新詠』『枚乘雜詩』共有九篇，除上述八篇外，另一篇是『蘭若生春陽』。又，『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篇，『玉臺新詠』亦收入，題作『古詩』。

② 羅振澤『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及年代』云：『謂「十九首」皆枚乘作者爲何人，已不可考。李善註「文選」云：「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車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皆不在「玉臺」枚乘雜詩之內，故知古有以「十九首」皆枚乘作者，但李善頗不謂然也。』

(『行行重行行』、『明月何皎皎』)，亦在『玉臺』枚詩之內。但都說是『擬古詩』，而不是說『擬枚乘詩』。陸機和劉勰的時代，早於徐陵，應該是更可靠的。

劉勰『文心雕龍』對枚乘之說抱着懷疑態度。他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冉冉孤生竹」)一篇，則傅毅之詞。』『詩品』謂：『「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舊疑建安中曹、王所製。』王世貞『藝苑卮言』說：『……意者中間雜有枚生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綜上各說，無論指名爲誰，都是出於傳聞或臆測，並沒有任何確實的根據。

說得語氣較爲肯定的是，『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但這話並不可靠。

鍾嶸在『詩品上』敘述東漢詩壇關於五言詩的創作情況，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傅毅和班固同時，曹丕『典論』、『論文』說：『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這是就當時情況而言的。其實傅毅早死，在文學上的成就，不及班固。范曄『後漢書·傅毅傳』說他『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

一 『詠史』的內容，是贊美綰榮上書救父事。詩云：『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憂斃。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恩古歌難鳴。憂心撫折裂，異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惄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縕榮。』

珠二十八篇》，並錄有他的代表作『迪志詩』一首，是摹仿『雅』『頌』的四言體。他自己的詩是這樣，和他齊名的班固的作品又是那樣，如果說像『冉冉孤生竹』那樣『婉轉附物，怊悵切情』<sup>①</sup>的五言詩出自他的手筆，那簡直不可想像。果真有之，范曄在本傳，鍾嶸在『詩品』裏也會大書而特書了。

早在陸機擬作的時代，東晉的初期，『古詩十九首』這一類型的漢代抒情詩已經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但作者爲誰，正如鍾嶸所說，『古詩眇邈，人世難詳』。蕭統總題爲『古詩』處理問題的態度是完全正確的。後來的一些主觀臆測，甚至如清代朱彝尊竟認爲『十九首』是『文選』樓中諸學士『裁剪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揉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概題曰「古詩」』<sup>②</sup>。無論說法怎樣新奇，但決不是建築在可靠的基礎上，對理解原詩不但沒有什麼幫助，而且徒亂人意。

『古詩十九首』究竟產生在什麼時代呢？雖說『人世難詳』，但約略可以推知爲建安以前東漢末期的作品。

『古詩十九首』見『文選』第二十九『雜詩上』，次序在僞蘇李詩的前面。蕭統之

① 劉勰評『古詩十九首』語，見『文心雕龍·明詩』。  
② 見『曝書亭集』卷五十二。

所以這樣排列，其用意和『詩品』所說的『固是炎漢之製』相同，只能肯定這詩篇是漢代的詩篇，而不敢說是西漢或東漢的作品。李善注『文選』據『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二句謂『辭兼東都』。意思是說，基本上是西漢的詩，其中夾有東漢之作。近世研究『十九首』的人絕大部分都認為『十九首』產生於東漢末期，但也有人說其中還雜有西漢詩篇。問題的癥結在於『明月皎夜光』裏有『玉衡指孟冬』一句話。這據李善說，是西漢武帝太初以前的曆法。這一涉及古代天文學的問題，本身就很難搞清楚，經過許多人研究，李說並不可靠。將在本詩中詳加說明，這裏就不重複了。

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綜合現存的漢代詩歌來看，不到東漢末期，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出現像『古詩十九首』這樣成熟的五言詩。這十九首雖不是成於一人之手，但是同時代的產物，則完全可以肯定。這不僅是從個別證據而得出來的結論；更重要的是，作品的本身，從內容到形式都透漏了它自己問世的年代。

### 三 『古詩十九首』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重大意義

『古詩十九首』產生於東漢末期，它標誌着五言詩在發展中達到成熟的階段，說明了這一類型的抒情短詩是怎样發生和發展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而文人詩篇和民間

歌謠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我們不難從漢代『樂府』演化的痕跡，辨明『古詩十九首』的源流；更可以從『古詩十九首』的出現，看出漢代『樂府』的輝煌成果。它的出現，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是一件大事。

第一，從西漢中期武帝劉徹擴大樂府組織，廣泛地採詩合樂以來，以至東漢末年『古詩十九首』的出現，這三百年間，中國詩歌是由民間文藝發展到文人創作的黃金時代的一個過渡時期。

『詩三百篇』主要是『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sup>●</sup>流傳在人民口頭的閭巷歌謠，我們只能從其中看出勞動人民在文學藝術上的集體智慧。由『詩經』到『楚辭』，由於屈原能吸取人民文學的精華，集中提高，而創造出他的獨特體製，則我們可以從『楚辭』裏看出一個偉大作家的創作成果了。

『楚辭』到漢朝被供奉文人沿襲其體貌，蛻化成爲『漢賦』。這說明『楚辭』的精神實質已分散到其他各類文學體製之中，而『楚辭』本身的形式則已漸趨僵化。『樂府』就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活躍起來，照耀詩壇，大放異彩。『「詩經」本是漢朝以前的「樂

● 見何休『春秋公羊傳注』宣公十五年。

府」，「樂府」也就是周朝以後的「詩經」<sup>(一)</sup>，雖然二者之間，在語言、形式、技巧和具體內容上由於時代不同而各有其特色；但論其精神實質，則後先輝映，完全是一脈相承的。

民間詩歌一經採作樂府歌辭，這種『感於哀樂，緣事而發』<sup>(二)</sup>的現實主義精神，和不可掩抑的蓬勃生氣，相形之下，立刻使一般廊廟文人『雍容大雅』的製作黯然失色。於是在民歌加工，寫定，集中，提高的過程中，同時也掀起了文人模擬『樂府』的風氣；影響所及，在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內都會出現一些天才的詩人。儘管他們還不是專力於詩歌創作，而且篇章散佚，姓名不彰；但可以肯定地說：漢朝的詩歌就是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發展起來，這也就是詩歌史上稱之爲『樂府時代』的道理。

『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可是建安以後情況就大大地改變了。『詩品』說：『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sup>(三)</sup>，鬱爲文棟，劉楨、

<sup>(一)</sup> 余冠英語，見『樂府詩選序』。

<sup>(二)</sup> 『漢書·藝文志』說：『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謡，於是趙、代之謫，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

<sup>(三)</sup> 指曹植兄弟。曹植於建安中封平原侯。

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以百計』。建安時代，是曹植、王粲歌唱的時代，詩壇上的著名作者並肩而起，這種繁榮熱鬧的景象，難道莫爲之先嗎？『古詩十九首』的出現，正回答了這一問題。

凡是讀過『古詩十九首』的人誰也不能不承認它的作者是具有較高的文化教養，傑出的詩歌創作的藝術天才，它和『質木無文』的『詠史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儘管我們無法考知其姓名，但這些無名的傑出詩人，正是曹植、王粲的先驅者。他們所創造的藝術成果，已預示着建安時代的即將到來。

第二，皎然『詩式』說：『建安用事，齊、梁不用事』。所謂用事，是指建安以後的六朝詩歌由於題材擴大而出現的『詠物詩』和『詠史詩』。『建安風骨』是指『慷慨以任氣』<sup>●</sup>的人生歌詠，是抒情詩的典範。它不但不同於齊、梁，而且有異於兩漢。這種詩風的形成，也有它的源頭。如果我們從『古詩十九首』上溯兩漢，下窺建安，又可以尋找出抒情詩在這一階段內發展演化的痕跡。

『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是一切民歌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漢代『樂府』的特色。『事』是客觀的現象，『哀樂』是主觀的感受；二者之間，血肉相聯，本來不可分割。

● 見『文心雕龍：明詩』。